

中国共产党“两个结合”的理论成就与重要意义*

[意] 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与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影响深远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挫折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思想意义超越了中华民族的边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通过“两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在新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两个结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①。理解“两个结合”，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我们在有幸见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飞跃的同时，也想借以反思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文化运动的颓势。

一、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但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理论。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探索的结合中得到了不断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

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学说是人类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①。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典型的欧洲文化渊源。同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今天仍然盛行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及这种经济基础与凌驾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列宁主义诞生于苏维埃革命的烽火之中。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在于其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更高发展阶段下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主义还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开辟了道路。此后，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结合的成果，其中蕴含着对被殖民、被压迫国家和民族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在必要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需要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理论创新本身恰恰是在实践和应对革命者所面临的具体情境中完成的。实践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果呈现的新内容，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形式，恰恰因为它是源自具体革命经验的理论结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挫折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东西方的分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结合西方国家革命实际作出了卓越贡献。

葛兰西是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能够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与当下之间作出巧妙的整合。由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进行的理论探索，意大利共产党人此后一直在寻求将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的革命理论发展置于意大利（或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可以说，葛兰西的理论探索也表现出了“结合”的特点。

早在1917年，年轻的葛兰西（1922年赴莫斯科前尚未系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就在几篇新闻报道中抨击了意大利社会党人所持有的决定论、实证主义和经济主义立场（“宿命论”的先兆）。他拒绝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谴责。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十月革命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它违反了社会主义本应经历的“必要”发展阶段的理论。事实证明，葛兰西比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具有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深入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

在1922年至1926年被捕之前，也就是葛兰西领导意共加强党的建设时期，葛兰西对党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功能表达了深切的忧虑：“这是我们的弱点……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传播意识形态……没有用……明确的道德和心理品质来强化党员的良知……需要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开始……要团聚在一起，购买图书、组织课程和对话……制定明确的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学习和考核标准”^①。这些思考催生了意大利共产党的许多出版项目以及仿照苏共建立党校的想法。

1926年至1937年病逝前，是葛兰西被法西斯囚禁的狱中岁月。1927年3月19日，葛兰西本人在给妻姐塔尼亚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写 für ewig，即永恒的东西。这证明葛兰西的理论抱负并不满足于眼前，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更深远的革命理论。事实上，《狱中札记》所提出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框架，至今依然是有效的。例如，葛兰西对东西方“市民社会”的分析。在西方，“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为保护资产阶级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保护带，要比东方社会稳固得多。东方“市民社会”的落后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市民社会”的强势则导致了西欧工人革命的失败。今天，帝国主义的压倒性意识形态及其宣传的突击队在西方社会表现出强大有效冲击力，再次表明了葛兰西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

葛兰西在比较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的思想时写道：“与马基雅维利相比，马克思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根本创新是证明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因此政治学在其具体内容（以及逻辑表述上）必须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有机体。”^②特别是，葛兰西在谈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写道：这个作为主角的“新君主”不应该是抽象的政党、阶级和国家，而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政党。它在一个确切的历史环境中，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在一个有特点的、明确的社会力量组合中活动^③。这是非常生动且深刻的，葛兰西借此展示了马基雅维利等意大利文化史上伟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应如何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资源进行理论创新。对待这些文化遗产，既不能全盘吸收，也不宜全盘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此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出现了某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停滞。在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之后，苏联的理论创新似乎陷入了僵局。苏联要么重提此前的陈旧发展论调，要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比如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及认为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成果，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却是止步不前的。

这一时期，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满足本地区阶级斗争的需要。时任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试图通过“渐进民主”和“结构改革”来破解意大利共产党因国内外政治形势而陷入的僵局，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陶里亚蒂本人在去世前几小时撰写著名的《雅尔塔备忘录》时，仍在力求破解彼时西方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难题。此后，新一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总书记的努力——

^① A. Gramsci, *Per la verità. Scritti 1913-1926*,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4, pp. 269-270.

^② A. Gramsci, *Quaderni dal carcere*, Ed. critica di V. Gierratana, Einaudi, 2014, p. 8.

^③ A. Gramsci, *Quaderni dal carcere*, Ed. critica di V. Gierratana, Einaudi, 2014, p. 10.

先是“历史性妥协”，然后是“民主替代”，最终遗憾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共产党引向了一条导致其更名易帜或更准确地说解散的道路。之后，意大利乃至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陷入了一种脱离实践的语料库式探索中。

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结合”：前提与成就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两个结合”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结合”的双方具有交互作用的契合性；第二，“结合”的双方具有观念相融的契合性；第三，“结合”造就的新成果形成了一种质的飞跃。“结合”的过程不是各方独立的机械叠加，也不是理论的简单并列，而是一个真实有机地相互成就的过程。

（一）契合性是“结合”的前提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①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是分析现实的最锐利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作用的发挥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相结合。令人欣慰的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确保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当然，这种契合也是通过实践逐步推进的，其间不乏挫折、曲折。

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伦理本也可以实现高度兼容，但是，由于反动派的煽风点火，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伦理之间的许多分歧被夸大，彼此间可能存在的契合性被模糊化、抹杀和否认了。天主教伦理也因此难以成为人民解放的工具。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抽象地存在契合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实践中具体化，在交互作用中具象化。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从人民需求中获得灵感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坚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指导下，实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文明的有机结合。

（二）“结合”造就新的文化形态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②新的文化形态是不拘一格的新事物，脱胎于母体而又有其别开生面的形态。

须注意的是，这个“结合”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其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指引和领导下的社会变革。没有党的“结合”意志的指引，“结合”就会在寻找最佳结合形态的过程中徘徊不前。

“结合”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③，使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的中华文明更适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应当今时代。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①，这种“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和地域情境中的应用。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实践和应用的“政治文化环境”。这样的“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后来得到列宁的赞同）：“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② 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新应用，都必须能够调适自身以适应历史上出现的新情况。必须指出的是，适应不等于歪曲，发展不等于改弦更张，创新不等于修正。改革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正如列宁所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机会主义的界限。只有把握意识形态方向才能保证这些进程的正确性。

在人类社会，不同生产关系往往是并存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只存在一种生产关系。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也存在着有限的合营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存在着提供物质奖励的劳动报酬制度；存在着根据价值规律调节最终产品进入市场和半成品在企业之间分配的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存在所谓“国家参与”对经济的干预，公共资本在战略和非战略部门的强势存在，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这无法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一切相提并论。中国在此进程中应该被赋予完全原创的理论地位。由于时间尺度和经济深度的差异，将之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进行比较也是不恰当的。

中国在新时代所获得的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所铸就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巩固，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延续与拓展。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呈现的新发展和文化新形态，还源于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

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如何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社会文明形态的呢？我们认为，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连续性和坚定性，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有力政治经济领导，就无法保证这一点。

（三）现代化与文明的连续性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沉淀时常表现出彻底抹去过去的记忆的强大意图。在古罗马，“记忆的诅咒”（*damnatio memoriae*）意味着政治失利者的面孔会从纪念碑上被抹去。在西方文化中，对过往记忆的消除多于对其进行的整合。例如，一方面，基督教得势后，异教神庙甚至图书馆——如亚历山大图书馆都遭到了破坏。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古希腊哲学的伟大经典是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重新传入西方的。另一方面，托马斯学派寻求天主教教义与亚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5页。

里士多德主义的结合。于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通过阿拉伯-诺曼艺术的奇妙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难得一见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光辉典范。然而，随着文化取消主义在当下西方的盛行，对过去的抹杀呈现出阵发性的怪诞色彩。诚然，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及做法与今天人们的感性认识存在一定张力，但偏见持有者因此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愤怒。这种愤怒不仅无助于产生一种珍视历史文明精华的融合性新文化，还会使曾经的创伤继续存在——而非为其愈合奠定基础。我们从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进程中汲取经验——这个国家成功地走出了梦魇般的过去。

扪心自问：西方以这种方式激化当代青年对历史的“反叛”，对谁有好处？将这种批判推向何等程度才是可接受的？是要让这些青年对本国历史形成成熟的批判性认知，还是要解构批判性思维——将之简化为摩尼教的对或错、好或坏？当然，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不可能完全是自发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操纵。显然，其结果只能是降低身处现代化之中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则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国古代文明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正确的、为当代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吗？儒家学说在今日是可以被全盘接受的吗？根据我们的观察，也并非如此。因此，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继承、发扬，在此基础上更新文明，塑造一种更丰富、更成熟的新文化。

在这里，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一种深层次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①。

（四）创新与意识形态立场

“两个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习近平主席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② 开辟新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视角，否则就会陷入缺乏主体性的折中主义。“开放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欢迎一切“新”事物而放弃旧事物，否则就为西方在“非意识形态思维”幌子下推广其意识形态打开了方便之门，或者与之没有什么差异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实际上，那些声称“不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的人，只是出于迷惑社会主义力量的目的，诱导其放弃自己的指导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使其怠于思考由胜败得失构成的历史以汲取教训。丧失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会沦为没有历史是非观的无知者，自然也无法以史为鉴确定未来的方向。这正是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损害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国家，即便那些反对单极主义的力量，如果没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会受到帝国主义宣传所强加的所谓时髦观点的摆布。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力量反对单极主义，却上了反华宣传的当；有的力量反对冷战思维，却分不清战争之风与和平之风的风向，不加分析地迎合各种具有迷惑性的和平主义情绪。

（五）主体性

习近平主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①这种辩证“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是什么？

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基于“两个结合”所产生的新的、卓越的辩证统一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已经指出的——我们也深表赞同的，这种“结合”不是折中，不是“拼盘”或简单的“物理反应”。如果一个群体不是因为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更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那又是什么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呢？这种认同感或主体性如果不是源自一种深刻的文化习得，那又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的发展始终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推动书籍的出版传播，鼓励大众参与有教育意义的演出，注重保护真正的民间传统等。

当然，经济和军事帝国主义也有其“文化”面孔。在当今西方社会，多数人不仅身处因反传统主义盛行所致的历史文化萎靡、扭曲的大环境，还要面对繁重生存压力下无暇顾及自身文化品位提升的窘境。西方城市社区、商业产品、电视节目和报纸内容等所表达的“文化”千篇一律，以极为单一的视角强加给欧洲各个民族国家。这种视角与其说是文化的，不如说是出于强化霸权目的而进行的宣传——它远离了人民真正的敏感性和需求，大大消解了各国人民的主体性。

社会主义中国恰恰相反。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②

三、“两个结合”的三重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结合”具有以下三方面重要意义。

（一）“结合”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成果。它关注的是当代问题，聚焦于独特的、卓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历史进程中的主客观条件，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两个结合”中实现的飞跃。这种辩证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其思想意义超越了中华民族的边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现代之路。可以说，由此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又比20世纪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一个结合”更侧重客观性条件，因为它涉及中华民族的物质和历史基础。“结合”的契合性前提以此为基础，但也无法脱离党的政治能动性和主体性。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非被动、机械的，而是极具历史远见的——同时着眼于本民族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第二个结合”更侧重于主观条件，因为它发生在文化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然而，“第二个结合”并未排除物质条件。正如在“第一个结合”中，物质条件占主导地位，但主观条件也不容忽视一样。“第二个结合”中主观条件居于首位，但物质条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了决定“第二个结合”可行性的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时空必然性。

（二）“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推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也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尤其近代以来，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获得了真正的稳定。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结合后会产生一种卓然的效果呢？

当然，地域的辽阔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是开启走向社会主义进程的必要条件。这些客观的历史地理条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主体性相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通过“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当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致力于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新的文明形态。

（三）“结合”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

“两个结合”进程中所造就的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容。

世界正以百年未有之速度演进，这种变化的全球性使其影响更为深刻，这构成了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在当今时代发生冲突的物质基础。

两大阵营的领导层是由不同的主角组成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和矛盾有加剧之势。霸权国家对其附庸国的经济“侵吞”行径愈演愈烈，企图在其他国家沉没时“独善其身”——迄今为止取得了部分意义上的和暂时性的“成功”。另一方面，日益密切和富有成果、成效的合作，为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吸引着越来越多决心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参与者。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一些长期发展

倡议，如“一带一路”的经济双赢倡议和摆脱冷战逻辑的国际关系新愿景等，都赢得了广泛赞许。须指出的是，这些倡议的根本保障就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之中。中国提出的系列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构成的有机整体，正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深刻分析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正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构筑并向世界展示其和平形象的重要原因。中国向世界表达和平诚意，不仅是基于自身战略和经贸利益的考量，还在于和平本就是深深植根于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特性。

习近平主席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①这句话无疑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但西方文明对这一原则的实践与中华文明完全不同。在欧洲扩张性的掠夺战争中，充斥着“文明”传播幌子下的意识形态清洗意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拿破仑战争、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的北约帝国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能说好战主义、掠夺和压迫倾向是西方文明所蕴含的特性而导致的结果吗？当然也不能如此武断。幸运的是，西方文明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远不止这些由于社会阶级关系演变所带来的负面特性。在西方文明中，天主教会及其价值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成为人民解放的工具。同时，欧洲的文化力量不同程度地屈服于党派纷争，政治领导层甚至也屈服于特殊利益间的博弈。这些特殊利益正在摧毁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将世界带到了核灾难的边缘。

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②，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显著影响，以及东西方发展道路差异的根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何能在“两个结合”指引下，秉持明智坚定的立场，在推动国际关系改善中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使当代中国站人类经济和社会尤其是文化发展的前列。

[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Alberto Lombardo) 系共产党 (意大利) 总书记，译者李凯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瑞 华]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